

# 夏收“农忙不见人”，“种粮人”在哪里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林嵬 宋晓东 于文静

5月末,产粮大省河南进入了忙碌的夏收时节。在河南省唐河县焦庄村,身穿黑色连衣裙、灰色高跟凉鞋的农民郭改声,轻松地挥动铲锹平整晾晒的麦粒。在她身后,60多亩麦田静静地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金色——除了几台收割机紧张地穿梭作业,广袤的田地看不到几个劳作的农民。

近年来,每逢种植或收获高峰期,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粮食主产区,越来越多出现类似“农忙不见人”的场景,与城市人心中忙碌辛劳的抢种、抢收画面大相径庭。

今天谁在种粮?未来谁当农民?

**手拿着镰刀没活几干,“农忙不见人”在多地成常见画面**

河南省新蔡县砖店镇的一片麦田旁,63岁的农民陈来背着手,在女儿陈小兰的陪伴下眺望远处隆隆作响的收割机。前几天,陈来把腿摔伤了,陈小兰从广州匆匆赶回来帮父亲收麦子。可没想到,还没赶到麦地,家里的13亩小麦已经快收完了。

“现在全部机械化,收麦真是用不上人了。”陈小兰拿着镰刀本想收一下机器收不了的边角地,没想到收割机一溜烟收得干干净净,小麦在地头就卖给粮食经纪人换成了钱,令她感慨不已。

事实上,无论春耕还是夏收、秋收,当下农田里看到的都是现代化的农具,“耕、耙、耖”这些老农具都成了稀罕物。

还有比陈来家更轻松的。周口市的农民于德军全家都在湖北打工,家里的8亩地托管给了一家农机合作社。一亩地支付400元,合作社便提供从种到收全程服务。于德军连老家都没回,地里的小麦不仅亩产稳超550公斤,8000来块的小麦钱也直接打到了他的银行卡上。

如今,“农忙不见人”在全国多地成常态。在新疆,春耕春播的农忙时节,田间地头看不到几个忙碌的农民,取而代之的是用上了北斗导航播种的“智慧农机”;在山东,一个种粮大户利用收割机,3天就能收完560多亩小麦;在河北,收割机进度飞快,而且作业数据可实时传输到农机合作社负责人手机上。

农业农村部统计显示,2018年麦收,大规模小麦跨区机收从启动到进度过8成仅用时17天,有5天日机收面积超过2000万亩,创历史新高。今年,农业农村部预计全国将有163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三夏”生产,其中联合收割机64万台,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27万台。

## “麦假”成历史,农业“机器换人”进程加速

在基层农业部门工作35年的任希山还记得,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每到麦收,农村学校还有“麦假”,不少单位和企业也会放假让职工回家收麦。

“夏忙不算忙,麦忙累断肠。”58岁的农民秦小凤回想起从前麦收的场面,苦和累涌上心头。秦小凤说,要收麦了,天大的事都得往后放一放,全家每天早上4点下地一直干到天黑,连收割带播种种一个来月。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60后农民逐渐老去,农村面临“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

90后不提种地、00后从未下过地”的问题。通过大规模“机器换人”,我国农业不仅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已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转向主要依靠机械动力,进入了机械化为主导的新阶段。

20多年来,中国小麦主产区完成了全程机械化的历史性跨越。从南到北,农机手利用“农时差”,创造出“跨区联合作业”模式,开辟出巨大的农机服务市场。

传统小麦生产从播种到收获,要历经耙压、施肥、除草、浇水、收割等22个生产环节,现在基本所有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替代。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陈曹乡尚庄村党支部书记尚水旺算过一笔账,如果8个小时计“一个工”,20年前,收6亩麦子得投入百十个工,现在只要十二三个工。同时,小麦亩产却从过去的300多公斤提高到500公斤以上。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477.21公斤,比2007年的382.54公斤增加了近95公斤。

## 未来的“种粮人”长啥样?

于培康是河南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他掰着

手指头算账:“与农民传统的分散种粮相比,合作社规模化托管,平均一亩地一季种植成本能减少100元,粮食亩产能提高近50公斤。投入更低、产出更高,粮食质量还有保障。”

从10年前开始流转土地种植粮食,到现在把更多的精力转向托管服务,给农民打工、为种粮服务,于培康的合作社托管土地已经覆盖了周边4个乡镇的60多个行政村,面积超过2.5万亩,预计到今年底能达到5万亩。

此外,一些接受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成为现代“新农人”。河南省郸城县90后年轻人左明飞,与22个回乡创业大学生组建“大学生创业联盟”,主攻农业现代化种植。

于培康和左明飞这样的“新农人”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正成为从事和服务粮食生产的主体。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说,到今年4月底,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20.7万家,成立联合社1万多家,辐射带动全国近一半的农户,为成员提供农资供应、农机作业、技术信息等统一服务的合作社占比达到53%。

小麦专家郭天财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进农业全程机械化,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道路是未来中国农业的方向,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都将进一步提升。(新华社郑州6月3日电)

## 河北:小麦开镰收获



6月4日,收割机在河北邢台经济开发区南阳二村的麦田里收割小麦。近期,河北省小麦陆续成熟,各地农民抓紧农时开展夏收作业。(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 今日关注

# “联合激励机制”让诚实守信者更有获得感

构建。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它是人类社会交往行动的普遍精神,也是人类共同生活的通则。古语云:“人无信不立,家无信不睦,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宁”。诚信既是“敬德修业之本”、“立政之本”和“利人之道”,又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美德。孟子提出的“诚信三原则”,即根本原则,互动原则以及共生原则。这三原则所反映的,正是诚信的本质。它超越了时空,在任何时候,尤其是在当前,都具有现实意义。

对于社会而言,诚信是必须遵循的公序良俗。一个人的诚信行为,很大程度上关乎个人的信用,甚至是整

个社会的诚信度。一丝一毫关乎节操,一件小事、一次不经意的失信,可能会毁了我们一生的声誉。常言道:“全能丢钱能丢,诚信不能丢”。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诚信总是与失信、无信共存。据统计,我国每年因失信付出了6000个亿的代价,这是多么惨重的教训。失信所产生的累积效应、扩散效应、负面效应是巨大的。古有“一失信而丧命”的故事,今有“信誉就是生命”的教训。“三鹿奶粉”的倒掉,老字号南京冠生园的破产都是“一失信而丧命”的深刻教训。

对个人而言,诚信是为人处世的一种美德。《礼记》有言,“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诚实守信是立身做人的基本

准则,每个人生活在社会都离不开诚信。诚实和守信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诚实是守信的基础,守信是诚实的具体表现,不诚实很难做到守信,不守信也很难说是真正的诚实。人人都希望在诚实守信和谐的社会环境中,都愿意与诚实守信的人相处、交朋友,都痛恨见利忘义、背信弃义的无耻行为。不管岁月如何变迁,不管环境如何变化,诚信永远是安身立命的道德标尺。

“联合激励机制”让诚实守信者更有获得感。“诚实守信个人实施联合激励”这是对诚实守信个人的褒奖,为诚信者加分鼓劲。也是对不诚信者的鞭策和倒逼。诚信是做人的根本。社会原本就是由人们之间各种各样的交往活动构成

的,而诚信就是维系人们之间交往活动的须臾不可断裂的纽带。诚信的链条一旦断裂危害的不仅是个体,更是社会诚信大厦的根基。而诚信一旦失去,也像千里长堤溃于蚁穴一样,最初只是从一次违约,一次贪利,一次借故,一次拖延,一次敷衍开始的。失去诚信的缺口一旦打开,那要想重新堵上,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失信祸及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诚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维护,唯有从我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人人讲诚信,诚实守信、注重权利、敬畏法律。着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让以诚待人,以诚做事,诚实守信,成为每一个人的共同行动自觉,如果人人都恪守诚信,那么社会大花园必将开出灿烂之花! (丛莲)

# 读书还是当网红,不该成为对立选项

看。一是,在一个移动互联网迅速普及的社会,年轻人的择业观被重塑,更多的年轻人青睐做主播、乃至“宁愿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无需过于担心。

新的社会择业观的形成,一定是对应着深刻的社会现实的变迁。就如“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特定年代被倡议,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所流行的“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而对应当前社会,新生代都属于互联网原住民,他们对互联网文化及其所衍生的职业的好感,也是整个社会互联网化的一部分。且伴随着社会的开放,对这些新观念、新的就业倾向,也有了更多的包容。

就另一个维度而言,我们需要警惕的,其实不是年轻人向往做网红,而是把

读书与网红对立起来,当成了二选一的选择题。一种声音颇有代表性,“我读书不行,大不了将来做网红”,仿佛“网红”是一条可以退而求其次并且随随便便就能够成功的捷径——这才是最大的谬误。

在现代知识社会,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要以一定的知识或者是相当的“读书”训练为基础。就拿主播来说,有调查显示,“高学历”已经成为目前头部主播的主要趋势。在全国范围内,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播市的市场学历最高,大专以上学历占比分别达到71.8%、68.9%、63.6%,且直播的收入与学历成正比。换言之,不读书做网红,成功的几率也要小得多。

而一个看起来“成功”的网红背后,可能是无数个“失败”的网红,网红行业并非天然就代表着风光。如《2018直播行业半年报》显示,头部主播数量仅占所

有主播数量的0.7%,收割了超过32亿的财富,占全部主播收入的68%。

因此,社会不必对年轻人青睐做网红表示忧心忡忡,更不必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训来束缚年轻人的选择。但是,对于将网红与读书对立起来,认为做网红就可以不读书的观念,还是应加以严肃的辨析。

这里面的分寸感如何把握是个问题。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教育,包括从家庭到学校,不必刻意贬低网红等新兴行业,更不必再视网红、电竞等新兴职业为洪水猛兽。相反,应该是帮助他们对于这些行业有更客观、更全面和真实的认知。如今一批“知识型网红”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在帮助社会重新认识网红职业,这其实是好事。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得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教育,需

要作出积极的、健康的引导。

另一方面,从大的角度来讲,将读书和做网红看成是二选一的选项,这里面也包含着多个层面的外部问题。比如,在消费主义的浸淫下,不少年轻人对网红的青睐,很大程度上也是鲍德里亚所定义的“符号消费”的一种具体体现。在物质丰裕时代,社会消费观念如何维持在一种理性范畴,是整个社会都应该正视的问题;再比如,读书还是做网红这一疑问背后,还是充斥着“读书无用论”的底色,或者说是在观念在互联网社会的一种变体。因此,拓宽社会的上升通道,遏制阶层固化的倾向,让“读书”的价值得到更大的彰显,仍需努力。

一个理想的社会之中,读书和做网红,不该是互相对立的选择。好好读书也能够成为“网红”,而网红也崇尚“读书”,这才是值得追求的正常现象。(朱昌俊)

# 治理“极限词流氓”需要法律规定清晰化

网络敲诈的“网络差评师”,现在又来了“极限词流氓”。

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极限词流氓”为什么会敲诈成功?或者换一个角度问:被敲诈的商家为什么甘心付钱?那个被敲诈后就付钱的商家说,自己也不清楚网店在宣传中使用的文字是不是真的违反了广告法,“做生意哪有不夸自己的商品的,我们平常也尽量避免用‘最好’‘最佳’这样的词,但商品页面上那么多介绍在不断更新,难免就会有没注意到的地方。”

甚至有这样一种情况:敲诈者威胁要举报的商家广告确实存在“最”字之类的极限词,如果被举报,确实可能会被工商部门进行处罚。

这里有事实可以证明:去年5月,杭

州方林富炒货店在经营场所内外及包装袋上发布广告,使用了“最好”、“最佳”、“最香”、“最独特”、“最高端”等绝对化宣传用语,被群众举报后,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广告法》第九条规定,处以罚款20万元。后经人民法院判决,认为方林富炒货店违法事实清楚,但认为原告的案涉违法行为情节较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对此处以20万元罚款,在处罚数额的裁量上存在明显不当,变更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中“处以罚款20万元”为“处以罚款10万元”;撤销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复议决定。

这就是说,如果商家的广告中真的使用了“最”字,确实可能被处以上万元乃至于20万元的罚款的。对此,被举报的商家岂能不害怕?愿意花点小钱安抚举报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看来,要治理“极限词流氓”敲诈,除了打击敲诈者之外,还需要让法律规定细化。

现在的《广告法》第九条规定,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第五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这让那些不经意就使用了极限词的商家很害怕。他们固然需要自

身小心,不要触碰工商部门规定的“极限词”,同时,工商部门应当对广告用语做进一步细化的分类和界定。好让商家心中有数,有具体的内容可参照依据,自觉回避“雷区”。

同时,对于违法触碰到了极限词的,也应该根据具体情节作出不同的处罚。例如今年3月18日,上海推出全国首份《市场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免罚清单》,规定在广告中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但广告主在自有经营场所或者互联网自媒体发布,且属于首次被发现的,属轻微违规行为,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如果是这样,“极限词流氓”想敲诈也就无法进行了。(殷国安)

# 一家三代人的麦收传奇

新华社记者 刘金辉

3日,200多台大型收割机在河南黄泛区农场的10万亩麦田里纵横驰骋,这些小麦将在5天内收割完毕。几乎同时,远在中亚塔吉克斯坦的黄泛区农场租种的4600亩小麦也开始收割。

从盐碱地到“中原粮仓”,再到耕耘海外,1951年建场的黄泛区农场经历了三代人的奋斗。

85岁的段守明是黄泛区农场第一代垦荒人,他1956年从河南淮阳县来到黄泛区。尽管已经经过几年的开垦,但土地仍然很贫瘠,生活条件也很差。“当时,我们四家人住在一间土坯茅草屋里,四个角各放一张床,用围挡挡起来就算家了。”

但段守明感到自豪的是,当时他所在的六分场有一台苏联制造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一边割麦一边‘吐’麦粒”。“每到收麦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像过年一样来看收麦,好多小孩子跟着收割机跑,这东西太稀罕了。”

地跨河南西华、扶沟两县的黄泛区农场,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黄河决堤造成泛滥区。新中国成立时,这里是一片沼泽荒原和沙地,为了开垦这片区域,国家在这里成立了“国营机械化黄泛区农场”,将当时十分紧缺的一些产自美国、捷克、苏联的先进机械分配到了这里,使这里的机械化水平远高于当地农村。

段守明说,仅这一台机器还不够用,遇到天气不好抢收时,还得靠人不分昼夜地用手割、灌包、打包、晾晒哪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这是一年中最辛苦也是最关键的时期。

段守明的儿子段富元参加工作已是20世纪80年代,那时农场的拖拉机几乎全是中国一拖生产的“东方红”牌,每个分场都有10台以上大型机械,麦收也变得容易起来。但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升,农场需要的人越来越少。进入21世纪,许多人开始到天津、河北、新疆等地承包土地,并尝试向国外拓展。

黄泛区农场境外投资部主任翟金中说,作为老牌国有农场,10多万亩耕地难以负担3万多职工的生活,急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早在十几年前,农场便开始瞄准海外市场,先后赴非洲纳米比亚、乌干达和东南亚柬埔寨、缅甸等国家考察。2013年,几乎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同时,农场相继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克兰成立公司,并将生产和加工的棉花销往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等国家。

段守明的孙子段林现在是塔中农业开发公司副总经理,他带领着17名“泛区人”管理着在塔吉克斯坦租种的25000亩土地,主要种植棉花、玉米和小麦。

“4600亩小麦用四台联合收割机10天左右就能收完。”段林说,“尽管黄泛区农场已经发展成为从种到加工、从农业到旅游、海内外联动的大型农业产业化集团,无论国内国外,麦收已成为一个非常普通的生产环节,再也无法引起轰动,但我觉得这始终是农场走向远方的根基。”

(新华社郑州6月3日电)

## 直抒己见

### 用现代科技破解“考生忘带身份证”挺好的

针对往年高考都会发生“考生忘带身份证”的情况,广东省公安机关充分运用智慧警务最新成果,在高考期间,各区县公安局关治安(户政)部门或基层派出所将在每个考点派驻专责民警,配备居民身份证阅读机具和移动警务终端,及时为考试主管部门、考生提供居民身份证真伪鉴别和人口信息查询、身份核验服务。也就是说,即便考生的身份证丢失了也不要害怕,只要借助现代科技,就能让警方的户籍管理部门在远程实现核验。科技时代,为身份证验证提供了更多渠道,但愿“考生忘带身份证”能用更多解题方式。(郭元鹏)

### “救命药”应避免非合理涨价

对冠心病、心绞痛等患者而言,价格低、见效快的硝酸甘油是关键时刻的急救药。可最近,不少患者发现,常备的“救命药”不仅价格涨了好几倍,有些药店还断货了。厂家回应,涨价是换了新包装,过去是机器自动生产线,换新包装后生产线用不了,改成了手工包装,所以生产效率也受到影响。长此以往,药企的核心竞争力下滑,对社会的贡献也会下降,不利于行业发展,也不会利于新药研发。因此,监管部门需要采取行动,严把药品审核关,杜绝“换马甲”之风,对借机涨价者施以重罚,以严格控制药品价格,避免非理性涨价。(江德斌)

### 严控减刑假释 关乎法治权威和公信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补充规定》。《补充规定》明确,依照贪污贿赂罪判处刑罚的原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罪犯,拒不认罪悔罪的,或者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不予假释,一般不予减刑。此次最高法院发布的《补充规定》,可视为对贪腐犯罪减刑假释工作进行制度加强,是从源头打补丁、补短板、抬门槛的重要举措。全方位堵住减刑假释制度的漏洞,让贪腐分子各领其罚且执行到位,才能公正、立正气、安民心。(徐建锋)